

《内蒙杂记》

毛主席的功绩为谁来

缅桂花开十里香

从边疆体验到国族认同

美丽边疆如何可能

超越苦难如何可能

山歌如火出胸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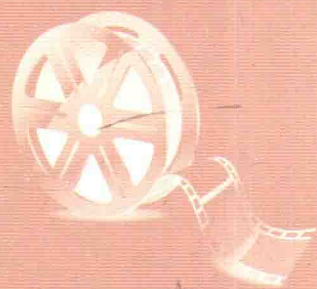
从「双百方针」到「新侨会议」

黎明前后的抗争

藏族人民再苦也有边

「东方红」以后

山雨欲来风满楼



余纪·著

国家建构的一个侧面

One Aspect of Nation-building

——“十七年”电影中的边疆叙事与国族认同



人民出版社

从边疆体验到国族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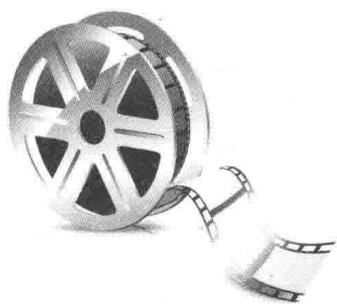
美丽边疆如何可能

超越苦难如何可能

山歌如火出胸膛

「新侨会议」

本书系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
(09AC003) 结项成果



国家建构的一个侧面

One Aspect of Nation-building

——“十七年”电影中的边疆叙事与国族认同

余纪·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晓燕

封面设计:九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建构的一个侧面:“十七年”电影中的边疆叙事与国族认同/
余纪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9

ISBN 978-7-01-016492-2

I. ①国… II. ①余… III. ①电影史—研究—中国
IV. ①J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1530 号

国家建构的一个侧面——“十七年”电影中的边疆叙事与国族认同

GUOJIA JIANGOU DE YI GE CEMIAN

——“SHIQINIAN” DIANYING ZHONG DE BIANJIANG XUSHI YU GUOZU RENTONG

余 纪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4.75

字数:240 千字

ISBN 978-7-01-016492-2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修史何妨效史迁

(自序)

记得那是2009年年初，在校园里偶遇学校社科处从事科研项目管理工作的吕刚武老师。此前，吕老师多次动员我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都被我婉言拒绝了，因为我实在不愿意仅仅为了稻粱之谋，硬逼自己到有兴趣、有真知的学术领域之外，去煞有介事地瞎折腾，同时，也是真不知道怎样才能设计出一个符合评审标准的项目来。但这一次，我被吕老师说服了。除了被吕老师的那一份真心诚意所感动外，当然也是当前大学校园里那不言自明的巨大压力所致。

在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时，设计“国家体验与国族认同：‘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文化意义与政治功能”这样一个课题，最直接的刺激来自2008年3月14日西藏拉萨发生的那场突如其来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以及此后数月中，北京奥运会火炬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接力时所遭遇到的无理干扰。我希望通过我的研究，从一个侧面回应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国民族问题的种种误读和曲解。说实话，作为初次涉足项目申报这种残酷竞争的新手，我对所申报的项目能否通过评委犀利眼光的审查，真的不曾抱有一丝一毫的希望，更多地，毋宁说是为了回报吕刚武老师的那一份古道热肠。当2009年7月下旬，我在北京出席云南电影制片厂一部新片的研讨会，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贾磊磊和北京大学的李道新两位师兄来向我道贺，说我“中了头彩”时，我真有点儿范进中举般惶惶然不知所措。

也是天意。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类项目评审会议于7月中旬召开，而当年的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当年艺术学科重点项目的六项“桂冠”之一最终落到我所申报的项目头上，这一

事件无疑发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初以我的自知之明，申报的是一般项目，岂敢妄想获得“重点”资助？而评审最终的结果却是这个项目被列为重点，编号为09AC003。唯一的遗憾是，或许是相关管理人员的一时疏忽，尽管这个项目已经从“一般”晋升为“重点”，但经费却依然按当初申报的一般项目的标准拨付，也即只有重点项目经费的60%左右。但对我来说，这已经是一个想都不曾想过的意外惊喜了。

我从事这项研究的一个优势，在于看过90%以上“文革”前17年间出品的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这当然和我打懂事起就爱钻电影院有关。或许是由于年龄的原因，当今依然还在从事中国电影史研究工作的国内学者中，具备这一优势的人应该不多。即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接下来就是一径坦途，而毋宁说是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

将“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发展历程放在国家建构与国族认同的历史/政治的理论框架中去思考，这在国内相关学科迄今已经问世的学术成果中，的确尚未见到，然而这也相应地带来一个难题，即怎样去结构并有序地展开和深化这一思考的过程，没有可资借鉴的范本。偷懒的做法，自然就是写一部教科书式的“新中国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史”，大体依照编年的体例，把材料按时序排列进去，同时，在论述中融入国家建构与国族认同的历史/政治主题。至于是否有读者，那就不管了。

然而，就在我大体完成资料收集整理，准备动笔的时候，这一偷懒的设想却被任职于中国电影艺术中心、分管学术研究工作的副主任饶曙光兄彻底打碎。2011年初夏，我收到曙光兄寄来的由他本人主撰的《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该著作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全书约51万字，从1927年出品的《木兰从军》，写到2010年开机的《梯玛之子》。也就是说，该写的，都让曙光兄和他领衔的团队写完了。如果我依然按照原先的设想去写，就很难做到不拾人牙慧，甚至要想逃脱抄袭剽窃之嫌都做不到。无奈之下，我只好放弃此前的所有设想，从头开始，另起炉灶。可此时离项目合同书规定的结题日期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了。我心中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就在我走投无路、焦头烂额之际，一个偶然的机，我与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同事、挚友黄大宏教授聊天，大宏兄提醒我，太史公《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相当详细地记载了汉代大文豪司马相如曾受汉武帝派遣，前往当时汉朝的西南边陲（今川西平

原与云贵高原接壤地带）驻节，运用“软实力”巧妙平息边乱，使地区社会经济文化获得长足发展的事迹。这一史料或许能对这个项目的研究发挥扩展思路的作用。由于此前忙于其他资料的收集整理，我一直没能抽出时间去阅读《史记》。如今项目卡壳，正好读书，于是，我将《史记》翻出来读。岂料这一读，不但读了司马相如，还读了有关李将军、匈奴、东越、朝鲜、西南夷等列传，解决了过去不甚了了的许多历史问题，更令我天眼大开，找到了一条既不与别人撞脸，也更适合自己的思考风格和写作习惯的结构体例。是啊，修史何妨效史迁？这才是正宗的中国式的修史之道嘛。

《史记》含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七表、八书，记述了此前华夏大地上三千余年的重要史实，为华夏文明延续五千余年而不辍立下首功。此后两千余年，从《汉书》到《清史稿》，这一体例为华夏历朝官方主持的修史工作所沿袭，直到20世纪中期以后才退出了通史类著作的领域。而现今坊间流行的通史类写作，体例大多自欧西或东瀛而来。这种演绎式的写作体例，比较适合于现代的课堂式教学，与《史记》那样以叙述为主的归纳式的、用通史统率专门史和断代史的写法相比，体例较为统一，也较为简便易学。然而，有其利者必有其弊。这种写作方式最大的弊端，在于其很容易将历史的叙述简单化和公式化。从当今大中学生对于本国历史记忆的大而化之、不求甚解等现象中，不难找到对上述观察的印证。这一弊端正在引起学界的普遍焦虑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尝试采用一种中国传统的修史体例来结构我们的历史叙述与论说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书在写作中借鉴了很多司马迁的写作方法。例如，打破体例的藩篱，将这种断代式的专门史与纪传体的史述笔法相融合，既不追求面面俱到，也不考虑平均用力，而是择其要点，在历史发展的关键点上不惜笔墨、浓墨重彩。又如，尽可能回到历史的现场，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细节，注重关键历史人物的心理推断，尽可能找到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以便尽可能保留历史的“体温”。再如，为了史述的可信，尽可能客观和公正，一般不对历史事件中的是非曲直作道德上的结论，只是将作者的见解熔化在对于史实的生动叙述之中，尽量给读者留下一个开放的阐释空间。

同时必须要说的是，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石泉先生的《甲午前后的晚清政局》，以及孔飞力（Philip A. Kuhn）先生的《叫魂：1768年

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等迥异于国内坊间流行写作方式的史学著作，也给了我很多启发和教益。上述前贤的史学著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是从历史庞大躯体的关键部位上，切开一个小口，带领读者从这条小口钻进去，直奔历史的“心脏”，也即历史发展的动力之源，去看个究竟。所以，他们的史学著作读来总让人惊心动魄而又觉酣畅淋漓。必须承认，这种“微创手术”式的史学著述方法，相较于过去常见的“全身解剖”式的“大开膛”方法，至少更容易为今天的读者所欢迎。

克罗齐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论断的正确性，至少在史论的层面上是无须质疑的。因为，没有一个史家不是其所处的“当代”的产物，其所面对的历史材料只能是当代所提供的，其所具备的历史眼光也只能是当代所赋予的，其所承担的历史问题也必须由当代社会向他提出，由此，史家要想跳出其所处的时代去透视、辨析、审读历史，就无异于提着自己的头发上天，因而绝无可能。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声言自己作为史家的立场。

不必讳言，本书作者就是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立场，去透视、辨析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围绕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所发生的那一系列是是非非、风风雨雨。包括作者在内的当代中国人，无不处在古老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华夏文明由盛极而衰走向再度复兴的道路上。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注定不会平坦端直，而只能是在湍急凶险的激流中“摸着石头过河”，只能在反复试错的过程中，寻找那条通达幸福彼岸的前路。基于这样的认识，及时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就至关重要，至少，我们必须要避免被同一块暗礁绊倒两次。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近代以来历史的研究，包括断代史和专门史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尤为紧迫。

当代欧美关于电影这一文化现象的论说中，处在显学位置的，无一不是将电影同政治紧密挂钩的学说。这至少从一个侧面证明，电影与政治脱不开干系。而这一点在新中国“十七年”时期尤其明显。如果说当代欧美有关电影与政治关系的言说还多少有些牵强附会的色彩，那么，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电影与政治的关系就是执政当局开诚布公的施政理念了。对这一点，我们拟不作任何评判。我们关心的是，这一时期涉及少数民族的电影创作和生产对于新中国的国家建构和新的中华民族的建构，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对于促进国民对于新中国的国家认同，究竟释放出了多少正向的能

量？在此历程中，这些电影的创作与生产曾克服了怎样的困难，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曲折？而上述这一切，又能为我们今天及未来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提供怎样的教训和借鉴？

经历了本课题的研究过程，我对于社科基金项目的看法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在今天的我看来，学术自由、学术兴趣与社会的需要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一定的条件下，二者完全可以兼容并且相得益彰。试想，如果没有这笔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就不可能有西南大学和西南大学文学院两级教育行政部门资助的、加起来还略多于前者的配套资金，没有这些物质基础，我怎么可能将一个潜伏心中多年的学术动机激发出来？又怎能有条件将自己的足迹印在北到内蒙古的临江屯，南到云南的西双版纳、瑞丽、大理、丽江，西到新疆的吐鲁番、奎屯、库尔勒、库车、霍尔果斯口岸，以及青藏高原、大小凉山、贵州的苗寨、广西的壮乡、海南的五指山、宁夏的腾格里沙漠等如此广袤的土地上，去获得那渴望已久的对于祖国边疆的亲身体验与认知？如果没有这份亲身感受到的体验与认知，我怎么可能完成这项必须要有真切的体验才能完成的研究工作？当然，也就更不可能将这份研究的成果交出版社，推向广大读者了。由此，我建议那些有学术准备、学术理想，也有学术冲动的青年朋友，不妨将自己的研究兴趣同社会的需要做一点对接，那样，说不定会给你带来意外的收获，使你的人生多一份精彩。

如果将古今中外史学前贤留下的宏大史述比作汪洋大海，那么，这本小书充其量只能算是一道很不起眼的涟漪。尽管如此，仍不妨碍作者将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最高史学理想，当作本书竭力去追寻的终极目标。虽不能也，但心向往之。

本项目在推进的过程中，得到中国传媒大学仲呈祥、中国电影家协会饶曙光、北京电影学院吴冠平、中国艺术研究院贾磊磊、北京大学李道新等专家教授的鼎力帮助和悉心指教；得到西南大学刘明华、王本朝、黄大宏等教授，以及张勇先生、吕刚武先生、刘帆副教授等好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西南大学文学院黎萌教授在百忙中通读了全稿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我的博士研究生王侠同学校阅了全稿，我的硕士研究生田俊同学帮我搜集和整理了图片。在此，谨对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当然，还要感谢我的母校北京电影学院，感谢给我学术滋养的罗艺军先生、郑洞天先生、钟惦棐先生、邵牧君先生、余倩先生、张骏祥先生。

最应该感谢的，无疑是我的妻子熊宗萍和女儿余姝，以及我的全体家人。没有你们的鼓励、支持、帮助和关怀，我不会有勇气迎接这项挑战，也不可能完成这项艰苦的工作。

是为序。

2015年5月11日
于重庆北碚·西南大学

目 录

修史何妨效史迁（自序）	001
第一章 为什么要思考电影中的民族问题	001
一、一座军事要塞引发的思考	001
二、国家建构与民族问题	004
三、新中国电影的民族问题思考	010
第二章 《内蒙春光》的历史意味	015
一、难产的“早产儿”	015
二、非同寻常的座谈会	020
三、违“宪”与护“宪”	026
四、作为范例的《内蒙春光》事件研究	031
五、周恩来定下政治基调	037
第三章 毛主席的马帮为谁来	042
一、全新原创的类型化故事	042
二、精巧包装的政治话语	047
三、影片与观众的同构关系	051
第四章 缅桂花开十里香	056
一、原来边疆如此惊险刺激	056
二、从小说到电影的脱胎换骨	061

三、英雄是怎样炼成的	066
第五章 从边疆体验到国族认同	071
一、历史任务与美学原则	071
二、古老中国边疆体验的兴废轨迹	073
三、接续盛唐气质，重造边疆体验	077
第六章 美丽边疆如何可能	082
一、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边疆愿景	082
二、大理三月好风光	084
三、诗意栖居的秘密	089
四、美丽背后的残酷物语	092
第七章 超越苦难如何可能	098
一、特殊年代的另类叙事	098
二、电影改编：从另类转换为主流	103
三、一场“极为罕见”的大争论	108
四、周公愿景：大爱边疆	113
第八章 山歌如火出胸膛	116
一、阶级的压迫与反抗	119
二、性别的反抗与文化的革命	124
三、妥善处理民族问题的妙招	129
第九章 从“双百方针”到“新侨会议”	134
一、定型与辉煌	134
二、作为前提的“双百方针”	139
三、“新侨会议”：号角还是绝响	143
第十章 黎明前后的抗争	147
一、行走在“钢丝”上的故事	147
二、三个女性和四个男性	155
三、艺术中关于“人”的觉悟	161

第十一章 藏族人民再苦也有边	164
一、藏族人民究竟有多苦?	164
二、中国黑白电影之登峰造极	170
三、吐登活佛形象的政治意义与美学价值	176
四、东西半球的两场“南北战争”	181
第十二章 “东方红”了以后	185
一、电影《东方红》的政治障碍及其扫清	186
二、“万水千山”中的“统一战线”	192
三、“各民族兄弟欢聚在一堂”	198
第十三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204
一、乱云飞渡难从容	204
二、乱局下的坚守	207
三、“我花开后百花杀”	210
结 语	216
参考书目	221

第一章 为什么要思考电影中的民族问题

一、一座军事要塞引发的思考

笔者对于影视片中民族问题的思考,始于一座距今七百多年的古代军事要塞,那就是位于重庆市合川区的古钓鱼城。

大约是在二十年前,笔者告别工作了七年的峨眉电影制片厂,调回位于重庆市的西南师范大学任教,开始了一手执教鞭、一手掌机器的“双重生活”。不久,重庆电视台的一位制片人送来一个解说词脚本,想请笔者根据这个脚本,为其拍摄一部有关钓鱼城的电视纪录片。钓鱼城距笔者工作的学校不远,虽然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但沿着紧邻嘉陵江的省级公路北上,汽车行驶约五十公里就到了。此前,笔者也曾不止一次前去游览,对那里的山形地貌、建筑规制、历史遗存等拍摄要素,也还算得上大体了解,所以,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下来。然而,当笔者阅读完这个脚本以后,才知道麻烦大了。

从事中国宋元史和世界中古史研究工作的人,都应该知道钓鱼城。这是一座耸立在川东丘陵地带嘉陵江边的大型台地。它由一座三面环江的硬质石山构成,拔地而起,雄踞八方,四壁陡峭如削,顶部却广阔而平坦,面积达 2.5 平方公里,与江面高差二三百米,一条大坡度的石板路通向山顶,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样的地形要是放在中世纪的欧洲,保不定又会筑起一座什么“堡”来,如卢森堡、福莱堡、哥尼斯堡之类。也就是说,在冷兵器时代,这样的巨石台地,绝对是天然的军事要塞。就是这里,在宋末元初发生了一场改变世界历史走向的、长达 36 年的战争。

公元 1258 年,蒙古大汗蒙哥挟席卷欧亚四十余国之威势,率军由秦岭入川,准备从西路南下,平四川,踏云贵,践两广,然后包抄偏安于东南的南宋小

朝廷。大军所向披靡，一路驰来无敢敌者。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年，也就是在1259年的2月，大军奔袭到这小小的钓鱼城下，却被挡住了，数十万兵马动弹不得。

原来，早在宋淳祐二年（1242年），南宋朝廷“以余玠权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任责全蜀，一应军行调度，权许便宜从事”^①。临危受命的余玠将军到任后，立即着手勘察地形，在四川盆地中选取了二十来座如钓鱼城一样的高台地，修筑防御工事，甚至向朝廷建议，将赵宋王朝的中枢迁来这边，以期同强元长期周旋。

蒙哥大汗哪里见过这等攻不下的城堡？倘若真的败在这小小的石头山下，他一世的英名岂不毁于一旦？今后还怎么坐得稳皇位？所以，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将钓鱼城拿下，屠尽城内所有生灵，以解心头之恨。于是，他命人在钓鱼城东距离较近的山坡上搭起一座高台。公元1259年7月，高台搭好，蒙哥大汗亲自登上高台，向钓鱼城上瞭望，以便策划下一步的进攻方案。

就在这时，一个改变世界历史的时刻来临了！随着城上一声巨响，从钓鱼城上发出的一枚“炮弹”呼啸而至，这枚巨石不偏不倚，正好击中了支撑高台的木柱，木柱顷刻断裂，高台轰然倒塌，威震欧亚大地的一代名将从高台上坠落下来。

摔成重伤的蒙哥大汗被抬上战船，本打算顺嘉陵江而下，运回重庆的大本营救治，岂料战船行至不远的嘉陵江温塘峡时，眼看人就不行了，急忙弃舟登岸，抬到峡中的温泉寺暂歇。还没等到军医赶来，蒙哥大汗就闭了眼。蒙哥大汗的逝去，引发了元蒙朝廷内部的一场激烈的政争。之所以说这一发“炮弹”改变了世界历史，是因为蒙哥大汗死后，远在欧亚大陆各处攻城略地的皇兄皇弟皇子皇孙们，再也无心恋战，纷纷偃旗息鼓，打道回程，昼夜兼程赶往大都（今北京城）。也不知让多少匹身经百战的蒙古骏马累死在了丝绸之路上，为的是金銮殿上的那把龙椅。这样一来，当时已经岌岌可危的欧亚大陆上的各大小公国，才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得以从头收拾旧山河；而收兵来到中原，过上温柔富贵日子的蒙古将军们，再也鼓不起当年扫荡半个地球的神勇了。从此，世界走上了今天我们所知道这条历史发展的道路。正因如此，西方历史学家称钓鱼城为“东方的麦加城”，又称“上帝折鞭处”。

^① 张习孔、田珏主编：《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3卷，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645页。

钓鱼城的战争一直打了36年。到1279年,当年跟着上山去抗元的壮士们一个个都垂垂老矣,再也打不动了,而山下在新王朝的治理下,百姓的生活也逐步安定下来。钓鱼城的守将见大势已去,遂令打开山门,向元朝廷请降。

如今的钓鱼城上尚存许多古代战争的遗迹,如城垣、门楼、排水道、炮架,以及研磨火药用的石臼等。同时,也有一些抗日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石刻,如蒋介石、冯玉祥、于右任、孙元良等人的题字,都是号召坚持抗日的战斗口号。原因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这里办了一个干部训练班。那时将干训班办在这里,当然也应该有拿古人精神激励当时战士的考虑在其中。

笔者之所以在读过脚本后感到麻烦大,是因为仅凭直觉,就感到脚本的主题既有悖于我国宪法的精神,也不符合我们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其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汉民族和蒙古民族割裂成了两个势不两立、敌对的阵营。不能说作者是故意要制造民族分裂,但作者的眼光和立场显然是停留在了蒋介石等人当年题写抗战口号的时代了。脚本原作者似乎振振有词,希望拿这个题材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笔者自认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爱国主义者,当然不会排斥弘扬爱国主义的创作,但是,笔者直觉用这样一个题材来阐释和弘扬爱国主义,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似乎是很不妥帖的。因为,以今天的眼光去看,当年钓鱼城发生的那场战争说到底也是中华民族内部的一场以王朝更替为主旨的战争,是新的统治集团同旧的统治集团之间的战争,充其量也只能说是中华民族内部两种亚文明之间的战争,而绝不能说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这样的战争与后来的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抗日战争等不是同一性质的,所以,同爱国主义是沾不上边的。试想,如果今天我们的公共媒体公然将宋末元初的那场战争说成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那么,蒙古族的观众看后将作何感想?因此,运用这个题材去弘扬爱国主义,只能是刻舟求剑、南辕北辙,甚至还有制造民族矛盾和民族分裂之嫌。

这样一来,拍摄就得改换角度,而笔者也得改写脚本,平添了一层麻烦;而如果原作者不接受笔者的观点,那争论就少不了,麻烦岂不是大也哉?

果然,整个拍摄过程就是一场不断争论的过程。这种争论没有结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当然,摄像机掌握在笔者手中,最终,这部电视纪录片还是按照笔者的思路完成的。仿佛记得原作者给出的片名似乎是“民族英雄”云云,完成时,笔者将其改为《钓鱼城怀古》。既然是“怀

古”，讲述者的立场也就中立化了。这部纪录片完全是站在一个学者的立场，对这座七百多年前的军事要塞给予客观的介绍，用冷兵器时代的眼光，发掘先人在战略学、军事学、地形学、建筑学上的智慧，同时，着力呈现其在世界近代历史发展中的独特影响和作用。其中的艰难，不及备述。

到创作拍摄电视纪录片《钓鱼城怀古》时，笔者从事电影创作和研究工作也有十多年了。在这之前，笔者对于电影中的民族问题是没有多大兴趣的，在学习观摩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时候，也未曾从国家、民族的角度思考过。这部电视纪录片带来的最大收获，却是让笔者开始思考一个问题——电影和电视片中的民族问题。因为笔者发现，原来我们历史中的那些看似不言自明的道理，在广大普通民众甚至一些看似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的头脑中，却还是一笔糊涂账。这笔糊涂账如果不把它理出个头绪来，将会给我们的现实生活造成诸多不便和影响，弄得不好，说不定会出什么大的乱子。这的确让人感到担忧。

十多年后，这种担忧不幸而成了现实。近年来，一方面，随着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开始显现，包括民族矛盾在内的各种矛盾的因子开始累积，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急速上升，世界上的各种势力或不习惯，或不适应，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叠加在一起，在世界上形成种种难以辨认的“乱流”，这些“乱流”卷起的“潮汐”，总会冷不丁向我们国家的“岸线”发起冲击。2008年3月14日发生在西藏和2009年7月5日发生在新疆的两个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就是笔者上述担忧最现实的注脚。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问题将长期地困扰我们，处理不好，就会出乱子。

电影是当今影响力最大的艺术形式。从事电影工作的人都应该明白，这种影响力是一柄双刃剑，处理得当，则收获巨大，处理不好，伤害也不小。在当今这个民族问题越来越复杂的时代，处理电影中的民族问题也必须慎之又慎。

二、国家建构与民族问题

在今天我们普遍使用的政治语汇中，有些概念的确是古已有之，如人民、疆域、法律、统治等，但也有一些并非古已有之，比如，国家（state）和民族（na-

tion)这两个概念就是近现代才有的。其中,国家这一概念或许在汉语古代文献中还能隐约找寻到某些远古的影子,而民族这一概念就完全是从西方政治文献中引进的了。

其实,民族这一概念在西方也同样并非古已有之,而是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而被西方政治学家们建构出来的——是的,作为一种政治概念来说,无论国家也好,还是民族也好,都是人为建构的产物。随着欧洲各地渐次步入近代,古老的王朝制度逐渐崩坏,为适应新的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制度,必须对社会的治理结构进行革命性的改造。正是在这一历史发展趋势的牵动下,欧洲才出现了如今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近代民族国家。

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崩塌到公元1453年中世纪结束以前的欧洲,是一片由数百个小公国构成的散乱大地,其政权的基础是武力加宗教,而核心还是武力。谁拥有武力,谁就拥有统治权,就能向人民征税。今天我们到欧洲旅行,时不时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城堡。这些城堡都不大,占地充其量也就数百上千平方米,但无一例外都是坚固的防御工事,不但易守难攻,而且还便于逃遁,实在守不住,通过暗道就可以溜之乎也。进到里面参观,你会看到那里不但拥有巨大的粮库和酒窖,更拥有庞大的武器库和黑暗的监狱,既阴森又恐怖。为什么建成这样?原来,它们都是中世纪欧洲各地统治者们为自己构筑的王宫,这些王宫集行政、军事、警察、监狱、居住、享乐、宗教机关的职能于一体。每一座这样的王宫就代表着一个王国,统治着周围居住的人民,向他们征税,管理他们的生活,协调他们之间的纠纷,同时,又可以从心理上震慑他们,使他们顺从,还能防备他们,万一他们不服统治起来造反,就可以依托这个防御工事抵挡一阵子,以待援兵。经过几百年的沧海桑田,到如今,这些城堡大部分都土崩瓦解、不复存在,剩下不多的都成了历史遗迹,作为旅游的景点,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开放。

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往往将这些城堡当作艺术品来欣赏。然而,笔者到瑞士游览,在距洛桑不远的日内瓦湖岸边,靠近法国边境,有一座名叫西庸(Chillon)水中城堡,在地下囚室里,笔者看见石柱上刻着Byron这五个字母组成的名字。翻开城堡的导游手册,方知19世纪初期,来到这一带从事革命活动的英国著名诗人拜伦在这个囚室里被关押了数年之久。由此可见,在当时被统治的普通百姓眼中,这些城堡都是强权、专制、剥夺、压迫的专政机器的一部分,都是罪的符号和恶的象征,狰狞可憎。想想看,当统治者需要将自